

大国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相互嵌入

■ 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关于大国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相互嵌套的这样一个历史理论和有政策的逻辑,这个是怎样一个故事?刚才讲的话,就是说作为贸易摩擦来讲,我们现在的视角非常丰富,大家不断从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化、意识形态、外交各个领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说法。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往往被忽略掉的一个视角,就是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大国的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看到实际上来讲,所有的新兴大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的典型特征,一定是各种中间产品国产化、国产化的比例和国产化的程度的上升。在中国这样一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业体基本完整这样的一个起步的阶段,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市场大国,它逐步地会形成一个一种成品,各种零配件,国产化的能力和文化比例的手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必然得跟全球价值链,以每个国家只生产产品的一部分,这样做会产生很多的重合,乃至最后的冲突。因此,全球价值链用任务和工序分工的方法,在全球范围内或跨国公司作为主体来选择各种比较优势,进而进行要素,比如基础上的这种配置,它跟我们的整个在工业化过程中规模经济不断

成长,进而把这种规模经济效应从单一产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这个过程刚好是同步发生。而这个发生的结果,就必然产生各种不可避免,而且对于从基地的这种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表现在产业链和需求价值链重叠的某些节点上,进而把这些节点不断地扩张以后,变成产品走向产业这样一个全面的产能过剩和资源配置。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实际上来讲的话,全世界都会预料到,或者都看到随之而来的印度、巴西等等大国,也会不断地步入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轨道。这是让全球的整个西方传统的发达国家跟新兴经济体之间产生长久的摩擦,产生一个甚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调和的一种矛盾,一种利益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点。看到这样的视点,我觉得中美贸易摩擦的整个的长期性,适合他的激烈的阶段性或者它的周期性,我觉得从产品生命周期也好,从规模经济成长也好,从要素禀赋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这种转换也好,封锁的转换也好,都比较容易给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一个全新的,然后又是根植于比较深厚的经济学视角和基础价值上的这样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和大国产业链之间产生的这种冲突,如果我们从它的冲突主体来看,

那么更明显地看到什么是政府的主导干预与跨国公司两者之间的这样的竞争和冲突,也就是说,这种赶超型的大国,它的国内在产业上、地区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的结果又在一个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整个过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借助于政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产生比较有效的干预。而这种干预的过程会逐步地演变成在产业链的整个打造的过程中,我们国家会有很多政府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

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的举国体制,可以举全国之力来进行科技的突破,进行产业的重点领域里面的这种填补空白,甚至有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产业链的核心阶段上的这样一种提升。而这样的政府驱动的这种状况,在全球价值链,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这两大主体之间的这种激烈冲突和矛盾,也会引发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形成国与国之间贸易摩擦激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我们看到跟大国的整个发展不平衡,同样相关的是什么呢?是政策的透明度不够,以及政策的整个变化十分的复杂。

我们国家整个开放的时间历时短或者很快,所以在相同的时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在不同的沿海和内地区域,可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政策,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而且我们看到即便是在

不同的时期,也同样经历过从重商主义到保护主义到自由主义这三种政策形态的过程。所以从静态上来看,可能存在的区域和产业上的政策的差异,从动态来说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这种政策的演变。那么在整个开发时间短且进度快的情况下,就容易给外界的认知上带来非常复杂的和非常模糊的,非常边界不清的一种认识。

而这种认识的导致也容易和他的引导也容易造成什么?造成冲突和引发这种摩擦。所以我认为从工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从政府和跨国公司,从政策的面目不清和边界的模糊,这三者之间不断地叠加了作为之间,甚至于新兴经济体、欧美国家之间这种激烈的贸易冲突和摩擦,这个是我们故事的基本内容。那么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相互嵌入的过程来看,从历史上来说,它的生成过程是存在统一性的。我们说从全球化,其实起始在殖民主义,在工商主义,在殖民主义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一直到产业全球价值的扩大和行程,也就是二次大战以后,大国的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存在着历史上的一个共生性,也是统一完成的一个过程。

后期大部分产业链的升值会延展的直接源自发达国家全球化进程,以及后期国家的操纵能力。所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单方向的这种资本和商品的流出,或者说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定会给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的某些节点上,激发或者说激活了它的这样一个增长点。而这种增长点如果碰到一个后起的大国,本身工业体系虽然相对落后,但是比较完整的情况下的时候,他会把整条产业链处于一个逐步激活的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产品和资本

的单向流动过程,恰恰是获取国家国内产业链的形成的过程。

那么后期大国的工业体系日渐完整,加快了全产业链的融合模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技术扩大的情况下,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互补性的切入就产生了,这个过程就形成了。那么如果在全球化的成熟阶段来看,两者之间就表现出了激烈的竞争性。后期国家的产业链和全球价值的重合度会不断地提高,这种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它是演化成商品和资本的单向流动,进入到一个双向流动,甚至是多向流动的过程。而在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横向流动的过程里面,产业和产业之间的重叠面就越来越大,因此全产业链模式和全球战略模式之间的竞争,也就逐步地从互补的竞争,互补性合作走向对抗性的竞争。

技术扩散和创新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导致的相互之间嵌入的深度越来越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一个相互不断的加重挂钩的过程。因此,是不是存在着区域化,是不是存在着决定价值链的萎缩,这是不是存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建构或者瓦解。我认为这个过程远远还没有到来。我们从后面的情况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契合的过程是越来越多,所以国家行为倾向于跨国公司垄断取向,恰恰是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达到峰值达到高峰的一个最主要的推进因素。

那么如果从全球战略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将在竞争中促进大国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一种深度的融合。因为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产业链,不管有如何的完整,而事实上都是全球价值链的部分。即便中国现在什么都能生产,148个工业品种,全球产量第一、全球销量第一,但是我们仍然要从中东进口石油,仍然要从海外

取得各种原料,还要去巴西和其他国家取得不同的矿石。因此,无论这个产业的如何完成,没有一个国家的产业链最终是完全独立于全球价值链之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仍然有很强的一个契合性。

全球化会最终使得这样的整合和融合过程得以完成。这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给他做了一个观察。那么如果从理论上的逻辑再做个分析的话,我觉得也有它的一致性和自洽性。我们看到先发的这样的一些大国,它的跨国公司,它主要的是基于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完成他的任务和工序分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形态上的这样的全球价值链,它属于我们说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初期形态。他所完成的规模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范围经济,是在不同国家借助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来进行的一种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组合和整合。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它跟整个贸易扩大可贸易化,先发国家的FDI和产业空心化技术扩散这样的全程的逻辑的进度,逻辑的进展,它不断地在推进全球价值链,向后发国家产生这样一种切入。而这个嵌入同时触发的后发国家得到一个空前的机会,进行产业链的造链,补链和破链。这个过程一旦完成,从静态来看,那么全球价值链单向切入后期,国家的产业链的反向的切入,形成了互补性的分工衔接。那么从动态来看的话,这样的一种非常切入过程会造成什么?逐步的重合,然后高度的重叠,最终走向对抗竞争。

而在对抗竞争过程中,由于后发国家本身是在一个自己的主权国家范围内完成的产业集聚,是在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独立的国家,在一个整个地理面积上,地理区域内非常集

中的一个范围内,实现的这种爆发性的规模经济。所以这种整个点上的爆发,跟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散乱的零散性的这种要素禀赋,这样的全点上形成了任务的工序分工,这样的网络上的分散的,所谓的范围经济的两者之间的竞争力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后发国家的这种爆发力,比先发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这样的全球价值链来讲,它的竞争力后发而先制造成的这种冲击是十分巨大的。

如果用简单的图形来表示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这么一个逐步重叠的过程。从大国的产业链,它从后面下方开始往上走,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是逐局部的节点上的一种重叠,可能这种重叠最初发生在整个微笑曲线的最底部或者最底端,但是经历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整个规模经济,再加以国家政府采用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比如说产业的政策,比如说国企的补贴,比如说过程中种种的其他的知识产权政策等等,那么一定会使得这样的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原发性、点状性呈现出缓慢渐进的特征,逐步地被大国崛起过程中后发性、整体性和集聚促进的特点所突破。

所以全球价值链依据分散各国的要素,比如形成的范围经济遭遇到了大国集聚的规模经济的强力竞争,这种重合度高摩擦度更加强烈。那么或许大国介入的要素,比如谈到市场与赶超的战略,并且基于本身规模经济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种动态比较优势的、全产业链性的这样的反向的持续深入的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这种能力,是过去老牌的这些国家所没有看到,所不存在的,从历史上来讲也是极为罕见的。所以产业链对于全球战略的重合面越来越广,除了在整个

微笑曲线的两端或者全球价值链,当我们还处在低端之外,可能在中间部分超越了全球价值链的底部,形成了巨大的一个重合面,这种重合面恰恰是贸易摩擦走向激烈,进而产生非常严重的贸易冲突,产生贸易战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域、最重要的地带以及最重要的重合的产业范围。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是起步于要素禀赋,但是形成和完成于规模经济,并且加刷于战略性的贸易政策把它推进。那么双边区域和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会推动两者之间的融合,这里面有很多的文献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新兴贸易理论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就从跨国公司这样一些微观层面来看,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生产率的差别不断促成产业链和价值链之间的统一性。

所以,现在从历史的文献可以看出来,两者之间来讲,不论是产业链还是价值链,在新兴贸易理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可以谈的解释发达国家出口,也可以解释新兴体的国家的企业的出口。因为都基于一个随机分布的生产力的变化,本身来讲,这个理论内生内部是有统一性的,但是我们在这个理论上却得出一个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脱钩这样的政策选择和政策选项,这里面是一个总的偏差,是走了个误区。我们看到不同的证据都表明,贸易和FDI提升的中国企业的生产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的位置,进而也有在很多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战略政策,提高了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的范围,也就是说从点上的切入变成了范围上的嵌入,还有很多文献认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存在总量上的互补关系和差额上的替代关系,也证明了价值链和全产业链之间其实

是有一种倒转的作用。

也就是说货物和服务之间的这种比较优势,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会逐步地产生替代、产生转移,产生互相之间位置的变化。那么最后从政策逻辑上来看,我们看到现在各国都在把对等贸易、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统一地纳入大家所说的自由贸易的范围。一般讲到贸易政策的时候,讲到保护贸易,讲的自由贸易就两种选项,但是自由贸易里面衍生出三种形态,一种叫做对等贸易,也叫做公平贸易,一种叫自由贸易。如果把他们的整个理论基础,把他们的政策的源头做一个分析的话,我们看到三者都披上自由贸易的色彩,但它的整个背景和内涵,理论基础是完全不一样。

对等贸易显然是一个以企业理论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核心的政策主张。欧盟的公平贸易主张是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的价值链的利益作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国家现在主张的自由贸易理论政策,它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主要是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我们讲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讲究的是国企的和央企的以及大的跨国公司在整个改变一个国家产业链,进而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的这种能力,这种动能是所谓的效率过程中所产生的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强大的竞争力。

因此如果认真分析的话,它的整个政策形态也是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之间实际上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化去研究和了解。之后的话,我觉得很多的也有的研究,对相互之间融合都有了不少这样的前瞻性的分析。▲

(本文全文转载《国际贸易论坛》2019年第四期)